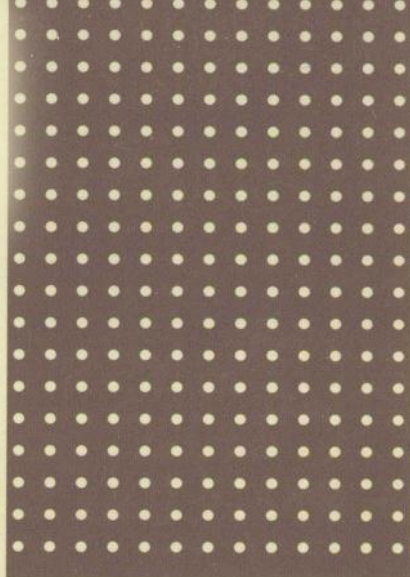




“三农”

问题的

SANNONG WENTI DE SHIJIAN YU SIKAO

实践与思考

“三农”

问题的

SANNONG WENTI DE SHIJIAN YU SIKAO

实践与思考

陈春生 ■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三农”问题的实践与思考 / 陈春生著. — 太原: 山西经济出版社, 2011.4

ISBN 978-7-80767-402-3

I. ①三… II. ①陈… III. ①农业经济-研究-中国
②农业经济-研究-中国③农民-问题-研究-中国

IV. ①F32②D42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55518 号

“三农”问题的实践与思考

著 者: 陈春生

责任编辑: 李慧平

助理责编: 解荣慧

装帧设计: 赵 娜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集团·山西经济出版社

社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4922133 (发行中心)

0351-4922085 (综合办)

E-mail: sxjfx@163.com

jingjshb@sxskcb.com

网 址: www.sxjjob.com

经 销 者: 山西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承 印 者: 山西三联印刷厂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6.25

字 数: 155 千字

印 数: 1-2000 册

版 次: 2011 年 4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4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67-402-3

定 价: 18.00 元

植根“三农”推进县域发展富民和体制创新

崔传义

改革和社会转型的时代给在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群众发挥巨大创造力提供了历史舞台，也造就了与群众需求相呼应的各种历史人物，其中包括地方的改革领导者及从政策研究上为群众创造科学决策提供支持者。农村人口占多数的国情，又决定了许多群众创造者的成长与解决“三农”问题紧密结合。由于城乡社会快速发展变革中的矛盾问题在基层表现得最为直接，群众的需求蕴藏在基层，群众的创造和探索也发生在基层，那些在县市立足基层的改革者、政策研究人员面向实际、回应群众、解决问题的探索，不仅推动了地方的发展和制度创新，也为上层决策者提供了作出正确选择的借鉴。本书作者陈春生，就是这样一位致力于“三农”问题研究的县级领导机构成员，他的调研文集紧紧围绕研究解决农村改革发展中的实际问题，一些深得要领、切中要害的分析判断，理论结合实际思考，深邃的见地，给人以真切感触和诸多启迪，对当前深化农村改革，推进县域发展富民和“三农”问题研究都有重要借鉴意义。

2010年春，山西经济出版社社长赵建廷同志约我和崔晓黎同志到太谷县调查，带领调查的就是身为县政协副主席兼城乡建设办公室负责人的陈春生。他带领我们访问了20世纪30年代梁漱溟提倡乡村建设时期有人系统调查过的贾家堡村，80年代原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确定并延续至今的农村固定观察点武家庄村，最新型的日光温室蔬菜大棚园区，在太谷的省果树研究所和山西农业大

学，及被称为“中国的华尔街”的票号建筑群。太谷也是为中国农村改革作出巨大贡献的杜润生同志的家乡。在调查中，我们深被这方使传统农业展现现代气息，人文积淀深厚，百姓勤劳智慧，知识和人才相对密集的宝地所感动。然而，最大的收获，是结识了陈春生。他1984年放下在省农科院的优越工作条件，回家乡太谷县的农村工作部开始了农村调查研究，至今投身农村改革发展近30个春秋。我们调查所到之处，他与农民和基层干部亲如家人，对“三农”情况如数家珍，对当前农村问题有难得的思考和独到见解。他谈蔬菜、林果等成片园区怎样由农民首先在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自发搞起来，孕育了专业研究会、由大户转变过来的或引进的龙头企业，政府予以规划引导和政策支持；谈山区开发，专业合作社问题，农民土地承包权、流转权的区别和现有法律在这方面的混淆。离开太谷后，又不断通过电话交流对农村问题的看法，特别是逐篇阅读了他的《“三农”问题的实践与思考》（即本书的打印本），使我对在工业化城镇化快速进展的今天，有这样植根“三农”、为农民着想的知识型领导干部，在杜老的家乡有这样的联系群众、研究政策，为县域科学发展、百姓致富而辛劳的工作者肃然起敬。文如其行，文如其思，文如其人。他的这部文集有几个特点：

一是立足实际和发展富民，深入调查研究，发现和回答县域农村改革发展实践中的突出问题。历史是群众创造的，改革以来，太谷农民通过实行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取得了主体地位，总是在争取农村经济进一步发展、生活进一步改善，也不断在发展中遇到新的难题，并为解决问题作出自己的探索和努力。作为县级领导机构的一员，陈春生多年来总是集中全力抓住每一阶段的主要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发现问题的所在和症结，把握群众的愿望和创造，找出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政府应采取的政策措施。他的行为说明，同样在县乡工作，同样面对一个阶段的大事，是否亲自下基层，进村入户向

农民了解情况，下调查研究的工夫，总结有关经验教训，分析政府行为和体制、政策的缺陷，是大不一样的。他的文章，有县域经济发展、农民收入等全局问题的战略思考，但多是针对一个阶段重点问题的专题研究，都贯穿着通过调查研究发现真问题、寻找解决问题方案的实事求是精神。如调查农业结构调整，他不仅摸清一个个蔬菜、林果、花卉、养殖片区在农户家庭经营中发生、群体发展到中介组织发育、园区形成及其发展前景与路径的来龙去脉，分析在全国产生影响的太谷瓜类研究会、养殖小区等新事物内在的动因和体制机制创新，而且重点寻找实践中要解决的问题。研究关系农民就业增收和地方发展的乡镇企业，认为其先天不足在生产布局分散、组织结构封闭、生产力要素落后、运行过程无序；研究关系农户经营与市场对接、与政府对话，争取在流通、加工、金融等领域权益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他发现发展迟滞的原因是绝大多数农民缺乏认知、外部缺乏实质性助力，缺乏具体的发展模式和思路的问题，认为对这个战略选择和深刻变革必须长期持续推进；研究山区山庄窝铺如何脱贫，他发现除了生产力和产业结构的问题，主要是居住点过度分散和资源处于封闭状态；研究农业科技体制，他发现部门结构等级森严、县级地位最低，重研究轻推广、中间阻塞，技术门类落后于实际，条块分割、自我封闭，投入不适应科技先行，造成县域科技体系难以解决农村发展难题的问题。由于他是贴近农民从基层实践进行的观察，就洞若观火，抓住要害，利于解决问题，推动发展，让群众受益。这些以围绕每个阶段突出问题为主的调查研究，汇聚起来，形成了在太谷反映出来的农村、农民、农业发展变革的历史脉络，也形成了涉及县域经济、“三农”发展多方面体制政策基本问题的框架。

二是既富有对农民群众的感情、推动农村发展的激情、对实践的直觉，又对实践中的基本问题从政策、制度的角度进行了理性的

独立思考。他善于接受外界的新理念，与本地实际结合，较早提出发展生态农业、观光农业、生态产业和产业的生态化，又在不少地方突破了似是而非的流行概念、时髦做法，提出了符合实际、抓住本质、有政策含义的见解，有的可谓理论创新。“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是农民权益问题。在太谷调查时，他认为实行土地家庭承包经营是还权于民的变革，不同意那种要发展现代农业，要跟进生产力发展完善生产关系就要抛弃家庭经营的看法，他说，太谷的精细、集约农业是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农户能够自己搞的高效农业，会自己搞，企业和中介组织要搞农民搞不了的。他提出农地承包权与流转权的区别，现在的政策文件、法律将两者混淆是不妥的。在《关于农用地权属概念的探讨》一文中，提出农民承包土地在农用地范围的流转，是以农户对集体土地的承包权为基础的，但流转与承包具有不同的特性。从农村经营制度的本质看，农民的土地承包权，是集体成员对集体所有土地的一种平等分享的财产权利，要求公开、公平、公正，与市场规则无干。这种承包权，是集体成员专有的、稳定的、长期不变的。在土地流转时，农民并没有失去土地的承包权，流转出去的只是土地的经营权（使用权）。土地经营权的流转，则受市场规则支配，按效益原则进行。“搞活经营权”是什么、靠什么？就是依市场规则，靠流转来搞活的。他指出，现行文件和法律所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是不妥的。在实践中，有些地方采用各种名目强迫农民出让自己承包的土地，美其名曰流转，这表明，对农用地权属概念进行科学界定，既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又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我国改革以来的一个收获，是从群众到政府都认识到体制、政策、法律是维护农民利益、权力，激发群众积极性、创造性从而推动发展的关键。政策来自实践，接受实践的检验，需要从实际到理论地思维。陈春生同志从现实生活中看出对农用地权属关系存在界定不清、使用不准的问

题，给予理论上的解决，对完善政策法律、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搞活农用地这块最宝贵的生产资源，具有很重要的价值。在这里显示出他高于一般实际工作者，也高于一些不太了解实际的理论工作者的地方。

三是服务于农民群众和服务于县域经济社会发展领导决策的结合。陈春生同志 20 多年从事与农民打交道的工作，与农民有割不断的血肉联系，始终深切地关注“三农”问题。他 1987 年任县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后来任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部长，统战部长等职，不论在什么岗位，都不离“三农”，坚持进村入户，持续了解农民的困难、愿望、权益与创造。正是由于他坚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发现和回答农村改革发展实践中的突出问题，因而所写的调查报告、文章，农村干部、农民都听得懂，所提政策措施具有可操作性，大多被一届又一届县委、县政府纳入了太谷县不同阶段的领导决策，用以指导实践、解决问题。其实，这类报告、文章，对指导“三农”工作的各级领导机构决策都是大有帮助的。

解决“三农”问题的着力点在县域。在我国 2000 多个县市中，一定有一批像陈春生那样的领导者、工作者，在勤奋工作、学习、研究中产生出一批来自实践、推动社会发展的文化产品、精神财富。我们应当珍视，认真学习。我们也希望这样的领导者、工作者，这样的文化精品更多地在全市涌现，这将会在县域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重大的作用，成为时代的光彩。

2011 年 1 月 27 日

心系“三农”，情牵太谷

赵建廷

陈春生同志要我写篇序言，我婉言谢绝。原因是序作者的水平应高于或与作者水平相当，这点本人还是有自知之明的。在此仅谈点出版《“三农”问题的实践与思考》的初衷。

20世纪80年代初期，陈春生的名字就见诸于《山西农业科学》，那时他在山西省农业科学院高粱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我在《山西农业科学》编辑部从事编辑工作。二人并未谋面，但他的高粱子粒灌浆规律的初步研究成果给我留下了较深的印象。

2005年9月17日，一个偶然的机会，在我的母校——山西农业大学，通过武星亮老师与陈先生相识。我们一见如故，围绕“三农”问题探讨许久。他告诉我一个想法：将杜润生同志故居开辟为中国农村改革纪念馆（展览馆）。恰好我也在思考2008年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之际，围绕“三农”做点事。不谋而合，自然谈兴很浓，话题很多，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啊！当时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是：虽朴实无华，但思想有火花；虽非伶牙俐齿，但思想活跃、视野开阔、谈锋很健，对农村工作非常熟悉，且有独到见解。临别时，他赠我一本册子，返并拜读，感到文如其人。

2005年11月26日，我给原中共中央农村改革研究室主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润生同志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如下：

杜老：您好！今年9月我在山西农业大学见到太谷县政协副主席陈春生同志，陈有意创办一个中国农村改革的纪念馆（或博物馆或展览馆），地址就设在太谷阳邑您的故居。我觉得这个主意很好。

中国农村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一个伟大壮举，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是全世界公认的。这段不寻常的历史值得记载，而记载有多种形式，在太谷创办一个中国农村的改革纪念馆不失为一种较佳形式。其理由如下……

2006年，杜老委派农业部农研中心杨力明等二人专程考察。我在并接上杨先生等二人直赴太谷。在太谷期间陈春生先生与武星亮老师全程陪同。走访考察了杜老的故居，阳邑村委会，太谷县委、县政府，山西农业大学，并与领导座谈。后因故未能办成。遗憾！此行我对陈先生的印象是：热情诚恳、思维敏捷，对太谷农村、农业、农民极有炽热感情，情况极熟悉；对杜老有浓厚的乡情，对杜老为中国农村改革作出的贡献充满敬意，是一位善于学习、勤于思考、具有解决问题能力的基层学者型领导。

2010年3月26~28日，我陪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崔传义、崔黎明二位研究员在太谷调研，陪同还有李慧平同志。其间陈春生先生、武星亮老师全程策划、全程陪同。我们朝夕相处，自然接触时间更多，讨论研究“三农”问题会更多、更深入，无话不说。陈先生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他酷爱太谷这片热土，对这个典型的农业县，这个有浓厚文化底蕴的县，这个具有得天独厚率先探索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县，这个生养他的县，饱含激情。对太谷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农民生活了如指掌，如数家珍。与农民在一起犹如家人，他关注农民、农业、农村，为农民着想，帮农民分忧。这使我联想到2010年5月7日，山西经济出版社成立20周年社庆前夕，在京请杜老题词时的情景。当时考虑杜老年事已高，尽量少写几个字，我拟了“关注农民”四个字。杜老提笔写了“关注农民，先组织起来农民协会”。98岁高龄的杜老时刻不忘9亿农民，在场的人无不为之感动。杜老多次讲过，要做中国农民的代言人。陈春生先生不正是一个县域基层的农民代言人吗？这次，他又给了我一本小册

子，即本书的书稿。两本小册子比较，可清晰地反映出作者 30 多年倾心研究“三农”问题的历程。从微观到宏观，从感性到理性，是一个不断探索提高的过程。其中不乏真知灼见，现援举几例。

一、关于农民增收问题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如何增加农民收入是多年来大家不断探讨的话题，可谓常谈常新。在《农民收入变动规律研究》一文中，作者以太谷县域为对象，在大量调查研究基础上，对农民收入增长规律进行了分析。认为“农业的波动是农民收入剧烈波动之源，非农业收入是农民收入的增长之源”。符合太谷实际，对相似县域具有普遍意义。要增加农民收入，从某种意义上讲，“三农”问题是如何实现非“三农”，即农民变为市民，农村变为城镇，传统农业脱胎为现代农业。

二、关于土地权属概念问题

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是农民的权益问题。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关于农用土地权属概念的探讨》一文，围绕农民的切身权益，研究了土地承包权、经营权、流转权等问题，对土地权属概念作了理性思考，对正式文件中“承包经营权流转”等提法提出了质疑，引起了国务院发展中心农村部的重视，特邀其参加 2010 年 6 月召开的“全国县域城乡一体化与农业现代化研讨会”。与会专家肯定了结论在理论和实践层面的价值。这是来自农村基层一线领导的研究成果。

三、关于统筹城乡发展问题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坚持统筹兼顾，把统筹城乡发展提高到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层面上。在此大背景下，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结合太谷县和左权县的实践，从理论层面上作了分析。写出了《欠发达地区统筹城乡发展的实践与思考》，该文对贫困地区和欠发

达地区的城乡一体化发展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与陈春生先生交往6年来，由于“三农”的情结，由于太谷的缘分，由于志同道合，我对其研究实践了解较多。他心系农民、情牵太谷，勤于思考、善于思考、持之以恒，调查研究、勇于吃苦、执著追求，站在全省、全国的角度，立足太谷县、晋中市的实践，研究“三农”问题，研究如何实现农业现代化问题。本书中的许多文章都属于第一手资料，是亲身实践总结，具有独到见解和可操作性。本书的出版对于指导县域经济发展，促进“三农”问题研究，有值得借鉴之处；对于鼓励和倡导深入实际、深入农村、深入一线，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也是有一定的实际意义。相信本书对中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各级领导和研究人员会有益处。这就是我推荐出版本书的初衷。

2011年4月24日于并

难止的农业生涯 难了的农业情结

(自序)

2002年4月，当我调离农工委转任政协副主席时，虽然提拔了，但恋农之情油然而生，好像自己丢掉了什么似的。为此，从自己过去20年的调研文章中选了20篇结集付印，算是一个总结。

时间实在过得太快了，离开农工委又8年了。虽然离开了农业和农村工作的主战场，但我的心始终没有离开过农业和农村。关注农民、关注农业、关注农村，成了我的一个天然习惯。伴随着“三农”发展的脚步，不时地思考着“三农”，并与大家一同走到田间，进入农户，深入了解“三农”问题。

在这8年中，太谷县委、县政府虽然三易其团队，但他们都十分支持我的工作，都给了我参与“三农”工作、研究“三农”问题的机会。这就使我关注“三农”的天然习惯更有机会与“三农”现实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与县委、县政府的“三农”决策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2001年，应时任县长赵春雷同志的要求，写了《以观光为主线，以园区为桥梁，全面加速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发表在《农业经济问题》上。

2003年，应时任县委书记高增光同志的要求，专题研究了太谷高效农业体系的问题，撰写了《发展畜牧中轴产业，建立高效农业体系》。

2004年，对农民收入增长规律进行了研究，得出了农民收入在剧烈的波动中增长的规律。这与我们统计系统层层上报的基本年年

增长的状况是完全相反的。而且明确指出，农业的波动是农民收入剧烈波动之源，非农收入是农民收入的增长之源。

2006年，时任太谷县县委书记郝耀平同志要求探讨农业现代化的模式，任务落到了我的头上。我起草了《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有效途径——太谷县农业园区化的实践与思考》。对太谷园区化发展的基础、类别及未来走向作了较为系统的探索，又一次对太谷农业现代化的模式进行了综合思考。这篇文章受到了好评。

2007年，面对新一轮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高潮，我深入实际调查，深深感到农民专业合作社虽然发展了，但在把农民组织起来和办成农民自己的组织方面，差距还很大。为探索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经验，我还在武家堡村组建了蔬菜合作社和养殖合作社，虽然难度大，问题多，但还是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同时还撰写了《农民专业合作社：价值·难点·对策》，表述了自己对发展农业合作社的一些忧虑与思考。

2008年，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在这一历史性的年度，全国各地开展了各种各样的纪念活动。我在征得县领导的同意后，与山西省农业经济研究所联合，专门在《农经研究通讯》上出了太谷“三农”问题专辑，有太谷县13位领导发表的文章，专辑中对太谷“三农”30年的发展作了粗浅的总结，对太谷“三农”的未来作了较为客观的展望。

与此同时，还应时任县长刘锋同志的要求，对太谷苗木花卉的历史、现状作了较为详尽的调查与分析，弄清了底子，明晰了发展思路。

2008年是中国农村改革的30周年，也是太谷历史上好事最多的年份。刘锋县长通过公开招考的途径升任山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郝耀平书记调任山西省建设厅纪检组组长，郝鹏鸿部长升任寿阳县县长。

新来的县委书记王建忠、县长郝向明，踏遍太谷的山山水水进行调研。历时半年，提出了太谷统筹城乡发展的新思路。于2009年1月出台了《中共太谷县委关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意见》。自此，太谷统筹城乡发展拉开了序幕，进入了新的快速发展的时期。

2008年12月，我写的《以观光为主线，以园区为桥梁，全面加速农业现代化的进程》被晋中市评为一等奖，并在大会上作了发言。在此期间，还应县委书记王建忠的要求，对全县的土地流转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调查与分析，撰写了《太谷县土地流转探析》，较为全面地分析了太谷县土地流转的状况、趋势、成因，对土地流转的范围、类别作了较为细致的探讨，提出了促进土地流转的意见。同时，对土地权属概念也作了理性思考，对文件里讲的和人们习惯上用的“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提法产生质疑，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

2009年是太谷统一认识，加快统筹城乡发展的一年。成立了统筹办，组织部部长刘凯宇同志任主任，我任副主任，致力于统筹城乡发展的日常工作。组织了对县委《中共太谷县委关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意见》的十讲解读，参与了江苏昆山和四川锦江区的考察，参与了《太谷县统筹城乡发展纲要》等各项规划的讨论。在这个过程中，自己对统筹城乡发展的认识有了提升，思路也得到了较大的拓展。2009年，还应县长郝向明要求，对太谷现代农业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参与起草了《太谷现代农业的实践与思考》，重点从“现代农业新格局，现代农业新体系，现代农业新路子”三个方面作了综合考察和理性思考。

日历很快翻到了2010年，根据预先的约定，我到左权，协助左权县委书记孙光堂同志整理其统筹城乡发展的成果，题目是《积极探索贫困山区城乡一体化之路》。左权的实践进一步表明，统筹

城乡发展在发达地区可行，欠发达地区可行，贫困山区同样可行。是一条科学、持续、和谐的发展之路。

3月下旬，与山西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武星亮教授共同接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崔传义、崔黎明研究员和山西经济出版社赵建廷社长、李慧平女士。这次接待获得了两项成果：一是把太谷作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的长期联系点；二是与新成立的山西省新农村发展研究中心（设在山西农业大学），建立了合作关系。

在太谷期间，专家们考察了太谷古城和南山生态农业区。考察后，专家们感慨地讲，太谷真好，太谷真美，太谷的文化底蕴真厚。

5月，为给太谷干部调整增加空间，作点贡献，我主动辞去了政协副主席职务。位子可以不要，但事情还是要做。只要太谷需要，我会尽力去做。

还是在5月，应山西省新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武星亮教授之邀，参与了确定研究方向与研究重点的事宜，并共同确定了2010年的课题是统筹城乡发展，具体内容就是通过对左权与太谷实施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实践的分析，总结出相应的不同模式。日前，左权模式的研究已全面铺开。

6月，我应邀参加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部在江苏常熟市召开的“全国县域城乡一体化与农业现代化研讨会”，提交大会的论文是《关于农用地权属概念的探讨》，与会的专家对文章中关于土地权属概念的研究表示赞同，认为该研究在理论和实践的层面都具有较高的价值。

需要强调的是，在政协的日常工作中，无论是江峰主席还是德仁主席，都十分重视调研视察，而农业是其重要内容，这为我深入“三农”一线提供了极好的机会。比如《太谷县红枣产业发展的调查报告》就是由德仁主席发起而完成的。

在过去的8年里，我虽然离开了“三农”的主战场，但始终关注着“三农”，品味着“三农”问题的苦与乐，探索着“三农”发展的新亮点。8年匆匆，又积累了10多万字的“三农”探索文章。这些文章与上次结集付印的文章有一同两异。一同是基本上都是源于太谷这块肥沃的“三农”土地中；两异是前20年的文章微观多一些，感性浓一些，这8年的文章则是宏观多一点，理性浓一点。

在匆匆而过的8年中，自己是充实的，更是幸运的。虽然付出了一些，但收获了更多。这要感恩于太谷“三农”的沃土，感恩于太谷县委、县政府的领导，感恩于我的妻子范志莲。

太谷是一块富有内涵、充满活力的风水宝地；是让我流连忘返、无法割舍的风水宝地；还是我有所感、有所思、有所为的风水宝地。离开它，我的这些“三农”探索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有幸与太谷“三农”结缘，是我人生的一大快事。

在这8年多的时间，太谷三易领导团队，他们都非常一致地与我探讨“三农”问题，给我以亲近太谷“三农”的机会。如果不是他们这样做，那么我的“三农”探索就会逊色很多。因此，我从内心感谢他们！

我有一个习惯，即每当我完成一项“三农”探索时，就会与妻子范志莲一起讨论，首先听听她的意见。她往往会提出一些很有价值的意见。更为重要的是，家里的大小事我管得较少，她承担了绝大部分，而且处理得非常得体。特别是对于这次我辞职之事，她表示理解与支持。并反复强调：自己的事，自己定，一旦决定，无怨无悔，不管发生什么事……在我对“三农”的探索中，有她的心血与功劳，我真诚地谢谢她！

将这8年多对“三农”的探索结集，是我的一个愿望。山西经济出版社社长赵建廷同志主动给我讲，你不要自己印了，把书稿给我吧。这对于一个基层“三农”探索者无疑是极大的好事。但从自